

“失去的东西常常是美丽的,它像珍珠一样埋在心底,引人遐思。”这话是她说的,但我恰如此,由于我的错过,竟从此失去了她这位杰出也是突出的文友。她曾是上海《文汇报》名记者,当年文坛风云人物,女作家姚芳藻大姐。

本人有幸,1953年就结识了她,还是在世所瞩目的抗美援朝前线。那时我是“最可爱的人”,她却是“祖国亲人”,作为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成员,来到三八线上,为浴血奋战的中朝军民,送来了中国人民的温暖与关爱。我们部队原是从上海郊区出发赴朝参战的,算是上海来的“子弟兵”,华东地区的“亲人”就来到我们部队。慰问团中有个采访组,主要是记者、作家等“笔杆子”们,专门了解部队的英雄事迹,好向群众宣扬,我是军里的小报记者,与文兵团创作员田金波一起,负责陪同引导他们采访,这就使我与这些“亲人”亲密接触了几个月。

芳藻大姐是《文汇报》记者,同组的还有《解放日报》记者刘氏(名字忘了),江苏《新华日报》编委、作家艾煊,厦门《厦门日报》编委许祖义等,还有一位南京大学女学生赵维志,正是这位小赵,后来和我有了故事。当年的我也爱舞文弄墨,又常画画刻木刻,并且通讯报道、诗歌短剧什么都写,芳藻大姐等要了我一些作品,他们回国后就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上陆续发表了,使我这个来自战场的小“毛驴”,被他们几位“伯乐”当“良马”推荐了,一度十分风光,一发不可收,从此不断发表文字和美术作品,芳藻大姐等也成了我最早的知遇恩师。

祖国慰问团于1954年初回国后,芳藻大姐等就连续发表了自己写的访朝通讯和报告文学作品,对我这个文学青年多有教益。不过那时我与她通信不多,主要和与她同



▲ 第三届祖国赴朝慰问团记者组合影,姚芳藻(右1)、洪炉(左2)。1953年10月摄于朝鲜前线(摄影:朝鲜前线志愿军随军摄影记者)

组的小赵联系,还悄悄谈了恋爱,只是后来并未成真。1955年我来京参加编辑《志愿军一日》,又考进了中央美术学院,芳藻大姐也来京成为《文汇报》驻京记者,其夫君梅朵正在京主编《大众电影》,他们同是《文汇报》的“老将”。在此期间我们虽少交往,却从报刊上不断见其大名和大作,特别是对文坛风云的及时报道,他们引起的“电影锣鼓”更是震动了中外。哪知风向一变,他们双双都成了著名“右派”,她还是“右派集团”的重要“女将”,我们自然也难以交往了。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才重登文坛,梅朵大哥更主编了深受读者欢迎的《文汇报月刊》,芳藻大姐不只成为“大百科”出版社的“女将”,又推出了秦怡和柯灵等的传记,双双又成文坛名人。我到沪就去拜访,他们都曾赠我新作。我有一次是应上海电视台之邀去沪的,他们将我一部写朝鲜战争的小说《我们十八岁》改编为电视剧,我去参加有关活动,到后先去了他们在江宁路的家。熟知影视创作的梅老(这时他已进入老年)提醒我,电影和电视并不是一回事,谨防被搞得失去品位

错过了,就失去了!

——追思女作家、名记者姚芳藻大姐

◆ 洪炉

【作者简介】

洪炉 1931年出生,笔名卢弘。13岁参军,18岁入党。从事军队宣传文化和新闻工作约50年,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等。50年代曾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绘画,担任《解放军报》社编辑近30年,发表大量美术作品,为军内外知名画家。后转入文学写作,发表、出版传记文学、纪实文学、长中短篇小说和影视剧多部,主要有《我们十八岁》《王稼祥一生》《李伯创作》《毛泽东亲家张文秋之家》《伍修权传》等。

变得低俗了。我连忙看了导演台本,发现果然如梅老所言,已使我的原作变了味,开机前夕当晚,我跟电视台主管电视剧的领导通了电话,表示我的意见说,改编本似已不再是我的作品,我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也不接受别人强加于我,这一电视剧已与我无关,你们想怎么搞就怎么搞,我不想再参与了。那位领导重看了我的原著与改编本后,同意了我的看法,决定立即中止,让我最好自己改编,仍由他们来拍。我考虑上海台对这种战争题材,可能不太适应,也就没有动手,这事就此作罢,他们已为此耗资不少,使我深感歉意。其中是非自可另议,我只维护了自己作品的纯正。不过促成我作出这一决定的,是梅老对我的及时提醒,这使我对他一直心怀敬意。

其实我与梅老本来不熟,仅因芳藻大姐,我们才一见如故,他在关键时刻帮助了我,后来他到北京竟几次来我家。当时我家没有电话,事先未能预约,他来了我却不在,就为我几次留条,恰又留下了他的“墨宝”式文物,见证了我们间的亲密友

谊。又一次我去上海,是参加文艺出版社关于传记和纪实文学的笔会,芳藻大姐也出席了,曾一起交流文讯,会后我再去她家看望梅老,他已卧病在床,躺着与我交谈,因我正进行党史军史题材的写作,又认真对我说,尽可能为后人留下更真实更准确的历史,而不是虽也“畅销”,却是半真不假似是而非的伪史,这是文史作者的应有品格,他正主编的《文汇报月刊》就是这么做的,都曾引起热烈反响。后来我也这么做了,曾出过几本书,但有几本却出不了,因为已涉及一些“秘史”,有的书稿一直压在自家!

新世纪以来我也老了,上海去得少了,即使去也身不由己,未能再去拜访二位。今年新春时节,芳藻大姐忽然来了电话,说是好久不见十分想念,我说自己也想念你,告诉她在《作家文摘》上,几次读到她的文章都如重见故人,很想向她报告近年的情况,并送上后来出的几本书,再告诉她当年曾同慰问团的小赵恋爱,后来又为什么没谈成等等。清明节过后我就去了上海,到后给她电话却无人接,我以为临时出门,或是

住到孩子家了,因我在沪时间有限,就托来看我的沪剧院老院长、剧作家余雍和,写好她家电话地址,将我的赠书转交给她,随后我就离沪了。回京后接到上海电话,说是芳藻的外孙小高,我在沪时她正住院,我离沪后竟已仙逝,我从此再也见不到她了!接着她女婿福林又来电话,说见到并读了我的赠书,知道我是其岳父母的文友,也为我们未能重逢而遗憾,他们父子又将二老的遗著及沪报上的怀念文章寄我,我一收到就急急拜读,正是从她的书中,看到此文前我引用的这句话,竟被她不幸言中!

由于我的原因,错过了再向二老求知求教的机会,此生除在朝鲜时,我与他们只见过几次,每次都有重大收获,如能不断交往,必获更多教益,但是我却错过了,并且从此失去了!尤其不该的是,我竟不知梅老是何时走的,我连向他致敬致敬的机会都已失去,又未能见上芳藻大姐最后一面,这都成为我的终生遗憾!从电话中得知,梅老是2011年辞世,恰是九秩高龄;芳藻大姐是今年4月20日走的,也已88岁,都属高寿,可庆可贺!只是他们的一生历尽坎坷,特别是姚老,全国解放前就坐过国民党大牢,迎来了新中国,正当意气风发为民高歌时,又双双蒙冤“反右扩大化”几十年,受够了罪吃足了苦,却又矢志不渝,人品文品一生不变,他们笔下不只再现了一个个文坛艺苑大师名人,更是浓缩了一段历史以至一个时代。正如梅老书中《追思阿丹……》一文所言,他面对病危充满遗憾的赵丹,“我的心默默地为他流着泪水”,“我要再次呼唤,不要忘记阿丹身上的伤痕,应该更好地爱护我们的艺术家。”

其实对于梅老、姚老自己,何尝不应如此呢?……

每当我听到优美的《二泉映月》二胡曲,总会被它那委婉动人的旋律而感动,总不由自主会对这首曲子产生格外的亲切感,因为记录这首曲子的杨荫浏先生是我的伯伯。

杨荫浏(1899—1984)是我父亲杨宗潢的堂兄,我们都叫他荫浏伯伯。他们都出生在无锡市崇安区新生路留芳声巷41号的祖屋里。那是我们高祖鹤秋公的居所,有二三百年历史的老宅院。大门是太湖石做的石库门,进门走过小院就是小厅和大厅,小厅两边是大、小祠堂,听父辈和兄长说这里以前摆放着祖宗的牌位。大厅的匾额上“怡清堂”三字还是清朝大臣李鸿章题写的。过了大厅是两进宅院,左边还有两进宅院,后面是一个院子。1949年前,父亲一辈的叔伯兄弟杨宗瀚、杨荫溥、杨荫浏、杨荫鸿、杨荫渭已先后离开无锡分别在上海、北京工作。生于1950年的我虽多次回无锡老家,但均不曾见过在北京工作的荫浏伯伯。只见到过伯婆(他母亲)、伯母(他夫人)、姑姑、堂兄、堂姐等。对荫浏伯伯的印象仅有他寄给父亲的信和照片以及父母的谈论中稍有一些了解。直到1972年我在吉林油田工作后,我到北京出差,回上海探亲,才有机会去探望过两次荫浏伯伯。

第一次是1974年初夏时节,我按父亲给我的地址找到了位于北京东直门外新源里中国音乐研究所荫浏伯伯的家。他住在一楼一单元一号。伯母在无锡,这里是伯伯一个人住,请了个阿姨帮忙照顾他。荫浏伯伯两个儿子也在北京工作,一个在轻工部设计院,一个在中科院,也经常来看望他。荫浏伯伯是中国音乐研究所所长,七十多岁还在工作有时还给研究生授课,只是照顾他在

杨荫浏为阿炳记录《二泉映月》◆ 杨廷杰

【作者简介】

杨廷杰 杨荫浏的堂侄,1950年出生。上海向新中学67届初中生下乡吉林。1972年调到吉林油田管理局。1987年上海海洋石油服务总公司归并于上海外经集团有限公司,曾任部门业务经理、上海海洋石油经贸公司经理等。2010年退休。

家里工作。他的房间既是卧室又兼办公室、书房、会客室。进门右边靠墙是一张床,床前是一把靠背椅一张大写字台,写字台前右墙是一只三人沙发和书橱。对面墙上挂着一把古琴。左边靠墙是一排书橱和一只电视柜,上面放了一台苏制二十几英寸彩色电子管电视机。那年荫浏伯伯已75岁了,但仍像照片上那样高挺的鼻子,眼睛炯炯有神,看上去就是一位睿智的老人。他烟瘾很大,我看到他坐在写字台前看书写字几乎烟不离手,想劝他少抽点烟,他对我说因患有肺气肿,家人及医生也都建议他戒烟,但这已是多年的习惯不想戒了。见到我去看他很高兴,他记性很好,我父亲的字号蔚文和闰宝他都记得,还告诉我,他们都称呼我父亲闰宝侄,也称闰弟。他询问了我父亲及家里的近况,得知我父亲“文革”也受到冲击,1972年平反,现已退休在家,很感欣慰。因为他的胞兄杨荫溥,是清华大学毕业后学校保送赴美国留学归来的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就是在“文革”初期不堪忍受折

磨含冤而死的。他得知我也爱好音乐,喜欢下围棋,就要我退了油田招待所的房子,来家里住几天。因此也使我有机会近距离地了解伯伯。

如果问音乐爱好者杨荫浏是谁,大家可能不了解,不熟悉。但要是问优美的乐曲《二泉映月》是谁创作的,大家可能都知道是无锡的民间艺人华彦钧“瞎子阿炳”。将阿炳创作演奏的乐曲在1950年夏天用钢丝录音机记录下来的人就是当时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杨荫浏和曹安和教授。杨荫浏是我国当代著名音乐史学家、传统音乐学家,是在中国音乐史学、律学、乐学、声学、音乐考古学、民族音乐学及传统音乐研究方面均有重大建树的大家。他研究发表的著作很多,其中《中国音乐史纲》、《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影响尤大。伯伯还编写了《阿炳曲集》等。

在伯伯家,他将我这个晚辈视作学生,给我讲了许多音乐方面的知识和他经历的故事,使我受益匪浅。我问起给阿炳录音之事,他说因都是无锡人,从小就认识,而且在三弦、琵琶的演奏方面曾向阿炳学习和切磋过,对阿炳是了解和熟悉的,也非常欣赏他的艺术才能。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0年夏天,时任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的杨荫浏和曹安和教授就带了一台当时可谓最先进的钢丝录音机,到无锡找到阿炳要给他录音,从乐器店为他借了二胡、琵琶。那时的阿炳因诸多不幸的遭遇已有三年不演奏音乐了,乐器也没有,已经完全荒疏了。为了

录音他坚持要先练习几天,三天后他演奏了《二泉映月》《寒春风曲》《听松》三首二胡曲和《大浪淘沙》《昭君出塞》《龙船》三首琵琶曲。阿炳听了录音,对自己的演奏并不满意,说需要再练习一段时间。约定半年后再继续进行录音。他表示,到那时,他一定能练好两三百首乐曲。令人想不到的是阿炳就在那年冬天突然吐血病故了。再次录音的预约也就成了一桩不能实现的憾事。但是已录音的六首乐曲已足以证明阿炳是一位了不起的民间音乐家。优美的《二泉映月》更是享誉海内外。

荫浏伯伯对我说,研究音乐光有音乐天赋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扎实的数学、物理等知识才行。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的是经济学,为了研究音乐,后来还特意向物理学专家请教物理知识。谈到十二平均律时,他说这是我国明代的数学家和音乐家朱载堉首先计算出来的。相对纯粹来说它是不准律。但由于十二平均律解决了自由转调的问题,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固定调键盘乐器上,如钢琴、风琴等。在具体的钢琴调律上他又说如果用频率音准仪完全按照十二平均律调好的钢琴会不如调律师以耳听调好的钢琴和谐好听,经过测试研究,音准仪和人对音的听觉感受有一定的差异,人的听觉认为准的音,在高频区比计算频率要高些,在低音区比计算频率要低些,即高音偏高,低音偏低,也称音准曲线。伯伯有一个美国朋友的弟弟是做管风琴的,原来生意很

小,后因较早掌握了音准曲线,做的管风琴和声与共鸣比别人做得更和谐动听,后来生意大好,成为美国生产管风琴的大公司。不过随着科技的发展,如今已研制出了含音准曲线的频率音准仪。给钢琴调律时,可以不用音叉取音……而是根据该音准仪可以直接从低到高逐个调好钢琴的88个音,很方便实用。

我发觉荫浏伯伯除了对音乐的研究,还是个多才多艺的人。荫浏伯伯喜爱下围棋,有一副扁型的围棋,是日本的蛤棋子,黑子是用天然扁扁石做的,白子是用海里的贝壳做的。以前经常切磋手谈的棋友有老国手过惕生,还有陈毅等六七位,我看到墙上还挂着为这几位棋友所题的一首诗。我第一次和他下棋时水平还不行,让我几子也输。他建议我买些定式类的棋书看看,还讲了棋手吴清源在日本番棋比赛中打破从角边开始布局的常规,黑棋布局从天元起手也赢棋的故事。我后来买了刘棣怀的定式,吴清源的星定式,板田雄男的围棋攻逼法等棋书。在油田工作时是单身,有时间经常下棋,进步不小,在油田的比赛中还得过名次。

第二次探望伯伯恰逢第四届全运会开幕的前一两天,伯伯还让单位给我送来一张开幕式票子。到了那天,伯伯幽默地对我说开幕式就是去看运动员踏步步,不如在家看看电视,我们还能下盘棋。也许是需要,他还爱好摄影……

